

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与社会融入

——以重庆为例^{*}

杨金龙¹ 王振欣¹ 陈新仁²

¹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²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采用问卷调查、变语配对测试、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及其在当地的社会融入度予以调查,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存在组间差异性。其中,智力型移民的方言能力最弱,投资型移民最强;研究群体对汉语普通话的态度显著高于重庆方言,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与“社会地位”维度;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情感认同”维度是影响研究群体的语言态度、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基于调查结果,文章从地区语言治理和话语规划两个方面给予相应的调适建议。

关键词 重庆城市新移民; 社会融入; 语言治理; 话语规划

引言

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通知。在此背景下,重庆市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的节点城市,在交通物流、产业支撑、经济辐射等方面显现出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之相应的各类人才需求日益凸显。实际上,随着重庆的国家战略地位逐渐深化,该地区对人才的吸附能力明显增强。据统计(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2019年重庆市常住人口3124.32万人,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086.99万人,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然而,重庆市较高的方言使用率对移民融入当地文化、生活形成一定的挑战:基于2017年搜狐网公布的全国各地人口方言使

用情况调查,重庆市6—20岁能熟练使用方言的人群比例达97.5%,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地高频的方言使用率。外来人口往往在心理层面与物质层面须由“过客”向“移民”转换(刘忠研,2013),而语言环境与语言能力是促进其融入当地的前提与基础(佟秋妹,2018)。鉴于此,随着大量以非重庆方言为母语的移民人口流入重庆市,该群体在当地工作、生活过程中所面临的语言服务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融入问题,成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治理研究的关注焦点。

一 城市新移民研究概述

城市新移民是指在全球化互联互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已在目标移居城市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住所,并具有定居意

^{*} 本文系国家语委2019年度重点科研项目(ZDI135—100)“新时代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项目(JY1965230)“‘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复合型国际事务人才的‘全人’培养模式探究”阶段性成果。

愿的流动群体(董星、马西恒,2008)。基于移民者从事的工作类型,周大鸣(2012)、葛俊丽(2016)将城市新移民主要分为以下三类:(1)劳工型移民。指以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操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移民群体,如工人、普通服务业者等。(2)智力型移民。指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中以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操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包括公务员、医生、教师等群体。(3)投资型移民。指以商品买卖或商业投资所得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包括个体经商者、企业和公司所有者等群体。

近年来,社会融入作为移民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相比较而言,语言学界的研究多关注移民的身份认同(杨晔、朱晨、谈毅,2019)、语言态度(夏历,2012)、语言使用(王玲,2012)、语言接触(武小军,2013)等,而上述语言因素与“社会融入”这一现实问题之间的界面研究成果较单薄。

实际上,“社会融入”作为一个典型的动态、多维概念,既受到经济整合、行为适应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身份认同、文化接纳等涉及语言或以语言为载体的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Dustmann & Fabbri(2003)的研究发现,掌握目标移入城市的语言是移民融入社会、得到劳动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Rendall & Tsang(2010)等的研究表明,语言能力是社会融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持不同语言的人群很难融入当地社区,甚至会受到一定的排斥;秦广强、陈志光(2012)提到,语言隔阂是流动人口拓展社会空间的制约因素之一;伏干(2014)认为,语言作为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表征,是影响移民群体社会融入的重要变量。据此,涉及移民人口语言隔阂与否的方言能力、涉及其文化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方言态度,与社会融入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就现

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围绕上述问题的相关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化。

综上,本研究以重庆市辖区内的“劳工型”、“智力型”与“投资型”三类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该群体的重庆方言能力、方言态度及其社会融入现状,分析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从语言规划视角提出针对重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现状的调适建议。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为调查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地方言的掌握情况、方言态度及社会融入现状,并从语言规划视角提出针对性的调适建议,本研究设有以下三个问题:

(1) 重庆城市新移民的当地方言能力、方言态度现状分别如何?不同类型的移民是否存在差异性?

(2) 不同类型的重庆城市新移民在当地的社会融入度分别如何?

(3) 研究群体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与社会融入度是否存在相关性?

(二)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为回答研究问题(1)与研究问题(2),研究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调查所用的问卷总体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栏,其中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来渝时间、从事的行业类型等。数据用于选择既定的研究群体,并根据周大鸣(2012)、葛俊丽(2016)的分类标准,将研究对象归为劳工型、智力型、投资型三类。

问卷的第二部分用于考察研究对象的方言能力。我们参考柳建坤、张云亮(2020)的问卷设计,并将方言能力进一步划分为“理解”与“使用”两个维度。该部分共设10道矩阵单选题,题目包括“重庆方言很容易

理解,我能轻松地听懂重庆方言”、“我在工作、生活中能使用重庆方言与当地人交流”等,每道题目的选项均包含“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基本同意”、“完全同意”5档,分别赋值1分、2分、3分、4分、5分(针对反向设置的问题则反向赋分)。上述题目的平均分即体现为研究对象的方言能力,其中包括“理解程度”和“使用程度”两个维度。

问卷的第三部分为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调查。我们参考杨江澜等(2016)的实验设计,将“社会融入度”分为“社会融入现状”与“社会融入预期”两部分。其中,前者用于反映移民对当前社会融入状况的看法,后者用于反映该群体对将来社会融入预期的看法。问卷中的每个选项包含“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基本同意”、“完全同意”5档,分别赋值-2分、-1分、0分、1分、2分(针对反向设置的问题则反向赋分),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即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融入度。

2. 变语配对测试

为了解目标研究对象对重庆方言的态度,我们在上述问卷中设置一份变语配对测试进行相应的调查。变语配对测试的刺激材料为一段日记摘录,录音长度约为58秒。研究组选择一位男性朗读者,分别使用重庆方言与汉语普通话阅读上述材料。朗读者是一位具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重庆籍志愿者,汉语普通话与重庆方言表达能力良好。随后,研究组将两段材料分别播放于被试。

在选择语言态度的评价量表时,我们参考徐晖明、周喆(2016)的实验设计,以三个维度共9项题目设置量表,分别为“好听”“亲切”“友善”“文雅”“有权威”“有身份”“方便”“容易”“用处多”。其中,“好听”“亲切”

“友善”类属于对被试情感认同维度的考察;“文雅”“有权威”“有身份”类属于社会评价维度;“方便”“容易”“用处多”则隶属于实用性维度。在刺激材料播放完毕后,被试须对以上9项题目分别进行评分,每道题目下设5级选项,被试根据每项的符合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计1—5分,代表被试对汉语普通话和重庆方言的态度。

3. 访谈法

为对问卷调查结果提供更多维的质性辅助资料,我们将目标研究对象分为“劳工型”、“智力型”与“投资型”三组,并以言语社区理论为基础,在相应的言语社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从而完成语料收集工作。其中,“劳工型”移民的语料主要在重庆市辖区内的“城中村”、码头、集市等体力劳动者密集处采集;“智力型”移民的语料来源于重庆市辖区内的主要高校及部分中学;“投资型”移民的相关语料主要来源于重庆市辖区内各类中、小型企业及商铺的法人代表。

三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 重庆城市新移民的当地方言能力现状

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研究组通过“滚雪球”式抽样法,运用问卷星在线上选择符合要求的志愿者,完成初步的问卷数据收集工作。随后,我们再根据问卷中的个人信息栏,剔除重庆籍被试群体;根据有效问卷的整体数量及不同类型移民的有效数据比,在相应的言语社区内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的数据补充收集工作。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共收集有效问卷262份,其中,源于“劳工型”移民的问卷87份,“智力型”移民的问卷97份,“投资型”移民的问卷78份。关于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重庆城市新移民的当地方言能力现状

	被试人数	对重庆方言的理解度	对重庆方言的使用度	平均值(方言能力)
劳工型移民	87	3.46	1.89	2.6724
智力型移民	97	2.39	1.47	1.9330
投资型移民	78	3.58	3.18	3.3782
重庆城市新移民总览	262	3.10	2.12	2.6088

总体来看,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当地方言的理解度(3.10)普遍高于使用度(2.12),但不同类型的移民之间存在差异:智力型移民的重庆方言能力最低(1.9330),该群体对重庆方言的理解度与使用度,均低于劳工型与投资型移民;投资型移民的重庆方言能力最高(3.3782)。如表 1 显示,在被调查的 78 名投资型移民中,该群体的理解度与使用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劳工型移民的方言

能力(2.6724)高于智力型移民,但低于投资型移民。

(二) 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当地方言的态度

如前所述,为了解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当地方言的态度,我们通过变语配对测试予以相应的调查。语言态度的评价量表参考徐晖明、周喆(2016)的实验设计,设“情感认同”、“社会地位”、“实用性”三个维度。测试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 重庆城市新移民对普通话、重庆方言的态度对比

	情感认同	社会地位	实用性	平均
普通话	3.6539	4.3651	3.8155	3.9449
重庆方言	3.4529	2.8130	3.9084	3.3914
配对 T 检验	.005*	.000*	.120	.000*

从测试结果来看(表 2),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当地方言的平均态度值总体处于中等偏上范围(3.3914),但该群体对普通话的态度显著高于对重庆方言的态度($P=.000$)。其中,“社会地位”维度的差异性最显著

($P=.000$),“情感认同”维度次之($P=.005$),而“实用性”维度未呈现显著性差异($P=.120$)。可见,与重庆方言相比,目标研究群体认为普通话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且对普通话附有更高的情感认同。

表 3 不同类型移民对重庆方言的态度对比

	行业类型对比	平均差异	P 值
对重庆方言的总体态度	劳工型移民—智力型移民	.04424	.652
	劳工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08866	.392
	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04442	.660

续表

	行业类型对比	平均差异	P 值
情感认同	劳工型移民—智力型移民	. 35865	. 003 *
	劳工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 44474	. 000 *
	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 08609	. 479
社会地位	劳工型移民—智力型移民	. 08082	. 543
	劳工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 11096	. 429
	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 19178	. 162
实用性	劳工型移民—智力型移民	. 30675	. 011 *
	劳工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0. 6779	. 592
	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	. 23896	. 053

此外,根据移民类型的不同,我们将三类研究群体的重庆方言态度在不同维度下进行差异性对比,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尽管三类移民群体的重庆方言态度在整体上未产生显著差异性,但不同维度下的组内分析显示,劳工型移民在“情感认同”维度与智力型($P=.003$)、投资型移民($P=.000$)均存在明显差异性;劳工型与智力型移民在“实用性”维度同样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性($P=.011$)。

针对特定群体之间在“情感认同”与“实用性”维度中表现出的差异性,我们采用访谈的形式做进一步调研,访谈结果对上述差异性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路径。例如,在对劳工型移民的半结构式访谈过程中,一位河南籍快递员表示:“我工作的地方大部分人都说四川话(重庆话),很少有(讲)普通话的……有时候碰到少数说普通话的顾客,(我)都愿意跟他们多说几句……至于重庆话吧,主要是感觉他们(讲重庆话的人)嗓门比较大,尤其是聚餐什么的……说话有时候也听不懂,虽然他们都挺热情的,但总觉得自己适应起来有点困难……你看周围都说重庆话,你一个说普通话的,就总觉得不是圈子里的人。”

在对智力型移民的半结构式访谈中,一位山东籍高校教师认为:“普通话当然听起来相对亲切一点,主要是重庆话有时候说太快了,听不懂。好在我身边的同事外地人也多,我们(之间)本来就是普通话……主要是买菜啊、装修房子什么的会和重庆人打交道比较多一些,校园里普通话(说普通话的人)总体还是比较多的。”

在对投资型移民的访谈过程中,一位浙江籍商户提及:“这边(重庆市)就是普通话讲的少……后来跟他们(重庆当地居民)一起玩嘛,打打牌什么的,有些话就能听得懂了……你不跟他们一起玩,就听不懂重庆话,听不懂重庆话,我这个生意没办法做的呀,没办法的事情,你得有意识地跟他们接触,慢慢学嘛……普通话当然好了,我听起来没那么费力……感觉确实要亲近一点,但主要是这边讲普通话的人少。”

可见,三类受访者对汉语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度普遍较高,均或多或少地认为普通话能够拉近交谈双方的亲密感,但受制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劳工型移民在工作、生活中须接触更多的重庆方言,这或许是激发该群体对普通话情感认同度更高的重要因素之一;相比较而言,投资型移民与劳工型移民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对重庆方言的依赖度较高，因而对当地方言的实用性感受颇深，而智力型移民在工作、生活中往往会接触到更多讲普通话的人群，这或许是该群体难以感受到重庆方言实用价值的影响因素之一。由此，在对重庆方言的“实用性”维度中，劳工型移民与智力型移民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投资型移民与智力型移民在同样的维度下虽然未呈现显著性差异，但其 P 值也接近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P=0.053\geq 0.05$)。

(三) 方言能力与社会融入度的相关性

对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度调查置于问卷的第三部分。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得分均值为 0.7939。其中，劳工型移民的社会融入度最弱 (0.6394)，智力型移民次之 (0.8041)，投资型移民则显示出对当地较高的社会融入度 (0.9535)，数据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概况

移民类型	被试人数	平均值
劳工型移民	87	.6394
智力型移民	97	.8041
投资型移民	78	.9535
总体概况	262	.7939

为了解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我们运用 SPSS 软件对相关数据做进一步统计分析，One-Way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5)：首先，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与方言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P=.010$)；其次，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度与方言态度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相关性 ($P=.019$)，且该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 ($P=.013$)，而在“社会地位”与“实用性”维度中并未体现显著相关性。

表 5 社会融入度与方言能力、方言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社会融入度		方言能力	方言态度	情感认同	社会地位	实用性
	被试人数	262	262	262	262	262
	P 值	.010*	.019*	.013*	.059	.245
	Pearson 相关系数	.159*	.145*	.153*	.117	.072

四 研究启示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显示，重庆城市新移民对当地方言的理解度普遍高于使用度，且方言能力存在组间差异性。其中，智力型移民的方言能力最弱，劳工型移民次之，投资型移民的方言能力最强；此外，尽管研究群体对重庆方言的平均态度尚可，但研究群体对汉语普通话的态度显著高于重庆方言，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与“社会地位”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劳工型移民由于暴露在更高频率的重庆方言环境中，致使该群体

对汉语普通话表现出更明显的“情感认同”，对重庆方言的“实用性”也体会颇深；最后，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度与其方言能力、方言态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且“情感认同”维度是影响研究群体的方言态度、进而影响其社会融入度的重要因素。

Park(1928)认为，融入的本质在于不同文化框架的不断碰撞与整合。个体进入新的环境后，不仅要在行为与技能层面进行调整，同时也要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新环境的一致性匹配问题 (Kristof-Brown, et al., 2005)。方言作为当地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强化社会互动、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机制(柳建坤、张云亮,2020)。这也为上述数据结果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路径:在缺乏充足的方言能力储备、对当地方言情感态度不足的前提下,重庆城市新移民在当地的社会网络存在一定的缺失,异质性社会交往势必匮乏(王春光,2001),其在新环境下的社会融入度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基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认为,调适重庆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可尝试从语言规划层面做出如下思考:

(一) 挖掘地区语言治理能力,关注城市新移民的语言服务需求

批评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如 Fowler et al.,1979; Kress, 2001),权利是驱动并内嵌于语言使用当中的,权利的核心在于所属群体的文化观念与其所赋予的社会共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语言行为与语言互动往往是塑造各类权利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移民人口对重庆方言的掌握度、情感认同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是影响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此外,劳工型移民由于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更高频度的重庆方言,涉及的语言权利问题尤为突出。鉴于此,充分发挥当地文化组织、公司企业、社区等层面的语言治理潜力,为不同类别的移民人口提供符合其工作、生活需求的重庆方言习得、科普活动,从而促进其更快地掌握当地方言、体验当地文化,是尊重移民人口语言权利,促使其在身心积极、健康的前提下发挥群体价值的有力保障。例如,社区联动引导下能够彰显当地文化特色的语言景观设计工作;高校与其他文化组织机构联动下的方言科普讲坛、方言评书等活动,均是地区语言治理的有效实践路径。

(二) 充分发挥地区话语规划潜力,聚焦对重庆方言的形象与对话力塑造

话语研究关注语言表征与语言形象,是国家、机构、各类组织建立和塑造自身世界观和形象的有效路径之一(Lo Bianco, 2005)。从全球视野来看,话语是国家形象、民族意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与竞争的重要路径(沈骑,2019);从相对微观的视角来看,特定地区的方言同样具有承载地区形象、传播地区文化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访谈语料显示,重庆方言在表达过程中,由于个别元音的拖长而响度较高,且存在詈语词汇较多的现象。这可能也是调查过程中,部分研究对象认为当地居民“嗓门太大”、重庆方言社会地位较低,进而影响其语言态度的原因之一。由此,从语言维、文化维等多层面对重庆方言的对话力给予相应的规划工作,是改善移民人口的方言态度,促使其更全面理解当地文化的有益尝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话语规划不仅在于政府层面的宏观统筹,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人话语规划也是规划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针对当地服务行业的话语培训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对方言使用的语言本体规划工作、社区与家庭联动下的宣传与实践工作,均是促进当地方言形象与对话力的可行路径。

五 结语

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是全球化 3.0 时期的重要特征。调适地区城市新移民的工作生活体验,使其在身心健康、积极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其领域价值,是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影响城市移民社会融入的语言维度出发,采用问卷调查、变语配对测试、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城市新移民的方言能力、方言态度及其在当地的社会融入度予以调查,并基于数据统计与分析结

果,从地区语言治理和话语规划两个方面给予相应的调适建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受制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研究的线下访谈数据收集过程较慢,且线上的问卷调查与线下的访谈在研究对象方面难以形成绝对统一,从而对本研究的调研效率与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权当抛砖引玉,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管窥之见。

参考文献

- Dustmann C., Fabbri F. 2003.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UK. *The Economic Journal*, 489.
-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et al.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ress G. 2001.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 In Wetherell M., Taylor S., & Yates 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Kristof-Brown A. L., Zimmerman R. D., Johnson E. C. 2005.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s' fit at work: A meta-analysis of person-job, person-organization, person-group, and person-supervisor fit. *Personnel Psychology*, 58 (2).
- Lo Bianco J. 2005. Including discourse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In Bruthiaux, Paul et al., (eds.), *Direc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B. Kapla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Park R.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
- Rendall M., Tsang F., Rubin J. 2010. Contrasting trajectories of labor-market integration between migrant women in We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6) 4.
- 伏干. 2014. 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能力的多维分析——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的证据. *语言文字应用*(2).
- 葛俊丽. 2016. 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 柳建坤,张云亮. 2020. 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社会*(5).
- 刘忠研. 2013. 青少年组织促进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
- 秦广强,陈志光. 2012. 语言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 沈骑. 2019. 中国话语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语言规划的新任务. *语言文字应用*(4).
- 佟秋妹. 2018. 三峡移民社区内部网络与语言使用情况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2).
- 童星,马西恒. 2008.“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 *社会科学研究*(1).
- 王玲. 2012. 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1).
-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3).
- 武小军. 2013. 流动人口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 *语言教学与研究*(6).
- 夏历. 2012. 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1).
- 徐晖明,周喆. 2016. 广州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与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3).
- 杨江澜,王洁,薛海娇,等. 2016. 流动人口城镇社会融入信心指数编制及应用. *人口研究*(9).
- 杨晔,朱晨,谈毅. 2019.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社会*(1).
- 周大鸣. 2012. 迁移与立足:新移民的城市认同. *深圳特区报*, 2012年7月17日.

作者简介

杨金龙,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 yangjinlong1011@126.com。

王振欣,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 1025536031@qq.com。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外语教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 cxr3354182@163.com。

Dialect Competence, Dialect Attitude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Chongqing

Yang Jinlong¹, Wang Zhenxin¹, Chen Xinren²

1.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matched guise test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alect competence, dialect attitude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Chongq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lect competence of Chongqing's new immigrants varies among groups; Language attitude of the study group towards Mandar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ongqing dialect, which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emo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aspec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the study group's social inclusion, dialect competence and dialect attitude. Moreover, "emotion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tudy group's dialect attitude and hence their social i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from regional language governance and discourse planning perspective.

Key words: new immigrants in Chongqing; social inclusion; language governance; discourse planning